



AJS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JSS, Vol. 1, No. 1, 2026, pp.46-55.

Print ISSN: 3106-6836; Online ISSN: 3106-6844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a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AJSS260106grvpm>



暴动的谱系：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与《万延元年的 Football》中的历史叙事

王亦凡 (Wang Yifan)

摘要：近代日本政治史中“暴动”传统始终呈现“暧昧”立场，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在追随西方与保持亚洲身份之间摇摆不定，而暴力活动则从樱田门外之变延续至 1960 年安保斗争，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显著现象。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 Football》中通过文学叙事重构了这一暴力谱系，将幕末的安政大狱、血税一揆等历史事件与战后学生运动形成时空呼应，借助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历史哲学框架，展现鹰四与蜜三郎兄弟分别承载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四国山村的地方暴动史与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交织展现了暴力如何从幕末志士、博徒延续至战后“暴力专家”，同时揭示了日本对欧美国家的矛盾态度——既憎恶又崇拜，既抗拒又依赖。超市天皇、大象等意象进一步具象化了战后日本的复杂心理结构，使小说成为解读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暴力循环与身份焦虑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暴动；《万延元年的 Football》；大江健三郎

作者介绍：王亦凡，在读硕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1169117828@qq.com

Title: The Genealogy of Riot: Violent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Silent Cry”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riot”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history has always maintained an ambiguous stance.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has wavered between emulating the West and preserving its Asian identity, while violent activities—from the Sakuradamon Incident to the 1960 Anpo protests—have persisted as a notabl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In *The Silent Cry*, Kenzaburō ōe reconstructs this genealogy of violence through literary narrative, creat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echoes between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Ansei Purge and the Blood Tax Rebellion of the late Edo period and the postwar student movements. Drawing on Walter Benjami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ōe portrays the brothers Takashi and Mitsusaburō as embody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ism. The interweaving of local riot histories in the Shikoku mountain village with nationwide political movements demonstrates how violence persisted from late Edo activists and gamblers to postwar “violence experts,” while also revealing Japan's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 Western powers—a blend of resentment and admiration, resistance and dependence. Symbols such as the Supermarket King and the elephant further concretize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ostwar Japan, making the novel a crucial text for interpret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identity anxiety in Japan's modern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Rioting; *The Silent Cry*; Kenzaburō ōe

Author Biography: Wang Yifan, Postgraduat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focus is on world literature, 1169117828@qq.com.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展现出“暧昧”与“暴动”的特征。作为亚洲首个现代化国家，日本曾试图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但屡遭挫折，导致其重新审视民族主义和东亚关系。日本在战争立场及对欧美干涉的态度上表现出“暧昧”。同时，“暴动”贯穿其近代政治史，施奈华（英子·丸子·施奈华，2023）认为“近代日本国家最初的诞生，本身即是暴力的”。从19世纪50年代黑船事件引发的动荡，到60年代的倒幕运动，直至明治天皇废除旧幕府制度，都非和平过渡。新政府成立后，政治暴动事件频发，直至20世纪60年代，面对新安保条约，日本再次面临国家命运的抉择，岸信介政府的冷战策略和民众反战情绪的冲突，再次体现了国家的“暧昧”与“暴动”。

一、近代日本的暴力结构与矛盾性叙事

日本在幕府末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和士族叛乱频繁发生。这些暴动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底层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另一方面，又为明治维新提供了社会基础。但在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却又遭遇了士族的反抗。这与明治维新所导致的日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有重要关系。此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日本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如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不完全是暴力的，但其中不乏暴力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施奈华（2023）指出日本政治近代史中暴力持续存在。近代日本国家本身即是诞生于暴力之中。而日本近代政治中“暴力事件”的主体主要为对当时政治体制的反抗或抗议的民众或特定群体，施奈华将这些人称之为“暴力专家”（violence specialists）。

施奈华（2023）认为，贯穿日本近代政治史的暴力行为，最终必然导致军国主义的崛起和对外侵略。不过，日本在面对欧美列强与亚洲国家时首先表现出的是矛盾态度。起初，幕府政府坚定地奉行“锁国”政策，甚至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为和平而锁国”的论调。然而，当听闻美国的佩里舰队已经驶入江户内海，幕府立即就做出了接受美国国书的决定，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害怕佩里及其舰队做出“暴戾之事”。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来自外部局势：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挫败，促使日本出现了一系列“求变”的思潮。但是，珍珠港事件又以战争的方式，表达了日本社会对美国的憎恨，并试图通过打击乃至战胜对手，从而实现自身的超越。这就是吉见俊哉（2024）所认为的

“美国作为欲望和憎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日本没有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观察。日本在继续以美国为欲望对象的同时，却对贴着‘鬼畜美英’标签的敌国的实际情况置若罔闻”。日本战败投降与随之而来的美军占领，再一次显示出日本社会滑向对美国军事力量崇拜的一极。据记录，日本民众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件数量高达 44 万封，这充分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占领军所持有的信任与依赖。袖井林二郎在对这些信件进行研究后认为“日本民众并没有将这位外来的支配者（指麦克阿瑟）视为异端，而是将其视为能够站在民众立场聆听民众倾诉的占领者”（吉见俊哉，2024）。虽然如此，这些信件也不应被过度解读为日本民众对占领军的单纯从属意识。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未曾处于“战败空间”（吉见俊哉，2024）。实际上，民众急于通过给麦克阿瑟写信的方式，展示新生的自我。不仅民众，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2013）在《菊与刀》中亦提及士兵中存在此类令人困惑的转变，当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战俘意识到失败后，他们迅速转向与之前效忠于天皇截然不同的另一极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处死战俘，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

自福泽谕吉构建日本文明框架，旨在摆脱“西方世界史”的影响以来，日本对东亚的态度呈现出复杂的矛盾性。一方面，日本自视为亚洲文明的先驱，承担着保护亚洲诸国免遭西方列强欺凌的使命；另一方面，日本却拒绝承认亚洲各国人民与之平等的地位，自诩为文明开化的代表。实际上，这种对“西方世界史”框架的挑战，不过是一种表面的掩饰。子安宣邦（2019）认为“‘世界史的哲学’最终只能成为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哲学粉饰，原因在于这些急于对日本上述地缘政治上的要求做出回应的哲学家们，只能将自己的哲学话语作为对抗性言说来构筑。正如对抗性言说总会如此那样，‘世界史的哲学’完全缺乏对自我本身的认识。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世界史’的审判者，在假想上编织出‘世界史’的终结和新世界史开端的话语”。其最终结果便是日本在亚洲地区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可见，日本近代史中的暴力行为与其国际关系具有逻辑与历史事实上的密切关联。其实，日本近代社会中的矛盾性，不止表现在上面所分析的幕府时代晚期的执政者以及普通民众的行为中，在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中也有非常深刻的印痕。例如，王升远（2025）指出，火野苇平这一战时就以其“士兵三部曲”而名噪一时的作家，针对战后官方的追责，他及其旁证者以其愚直、被动的性情否定有关其战时“积极活动”之指控；又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者、反军左翼作家自认，否认鼓吹军国主义的过往。事实上，这种“对内人道，对外军国”的思想恰是亚洲诸国频频陷入日本侵略之灾的因由。火野将战败责任归罪于军阀，为天皇和士兵脱责，这是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从运动到体制的消解；同时将个人罪责归为爱国抗美，虚化了日本对亚洲诸国之战争责任。这种不彻底的罪责反思对理解以日本为代表的战败国战后思想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另一个例子来自战后因写作《大和战舰的末日》而声名鹊起的吉田满，他在盟军审查的政治压力与来自左翼文坛、幸存士兵等所代表的社会批判等多方挤压下，对自己的作品几经修改。这反映出作者内向省思并外向回应自我的战争责任问题。然而吉田满虽意识到这一切根植于“国家一个人”关系，并论及“市民”姿态，但依旧为士兵之死赋予了“国家”意义。如此，则“市民”的独立精神终将为“国民”的身份认同所架空（王升远、陆相凝，2025）。回到本文研究的大江健三郎，他在 1994 年诺奖获奖演讲中提到川端康成，他称川端发表的《美丽的日本的我》“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实际上，大江对川端康成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并主张将日语中的“暧昧”（あいまいな）一词由川端翻译的“vague”重新译为“ambiguous”，并强调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大江健三郎，2006）。基于这种立场，大江针锋相对的将川端的篇名改为“暧昧的日本的我”。我们据此可以认为，大江作为一个作家的定位，正在于正视日本之“暧昧”（ambiguous），

而不是如川端一般遁入“vague”所营造的充满禅意却又无法通过语言进行理解的虚幻世界。说到底，这不仅是文学理念上的分歧，也是对于国家的历史与未来的态度方面的分歧。

二、百年前后的暴动

暴动是日本现代政治暴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它贯穿于日本的现代化当中，并在民主的进程下反而愈演愈烈，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高潮。施奈华（2023）认为“1960 年可说是具备了煽动政治斗争所有条件的一年——日本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九州三池碳矿罢工、成千上万人抗议《美日安保条约》更约的大规模示威，以及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众目睽睽下被暗杀”。虽然各是独立事件但其背后是一场巨大的政治纠纷。

1960 年安保斗争是日本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也是大江健三郎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鹰四参与的学生运动原型。这场斗争源于《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争议，核心矛盾在于条约强化了日本作为美国东亚冷战前沿的军事附庸地位，规定驻日美军享有治外法权却不承担防卫义务，引发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与和平宪法崩坏之忧虑。这场以“反安保”为名的运动，深刻重塑了日本社会，其本质是对战时体制复辟的全民抵抗。小说中鹰四的精神创伤与集体记忆，正是这段历史在文学维度的投影，对 1960 年风暴如何成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分水岭做出了生动注解。

同样，安政五年日本政府也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不平等条约，即《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赋予美国特权。自此，日本的锁国时代告终。与《日美安保条约》一样，《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也引起了日本国内不满情绪进而引发政治暴动事件，即樱田门外之变。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于 1858 年独断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激化与尊攘派矛盾，其发动的“安政大狱”血腥镇压水户藩等反对势力，最终导致 1860 年 3 月 18 名水户浪士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杀井伊。此举成为幕府权威崩坏的起点，接任者安藤信正推行“公武合体”政策，通过联姻调和朝廷与幕府关系，却遭 1862 年坂下门之变刺杀冲击，幕府统治根基进一步动摇。1867 年德川庆喜被迫“大政奉还”，次年江户无血开城，幕府时代终结，明治维新开启。

小说中蜜三郎与鹰四相互对抗的关系，可与本雅明（2014）对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分析联系起来予以认识。这种思想立场的对立是深深植根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政治暴力传统——从樱田门外之变到安保斗争，历史叙述权始终是权力斗争的核心场域。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因其对历史在人类文明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了一种面向历史的宗教崇拜，其对历史进程的认同，甚至以自我说服的方式达成与胜利者的共情。小说中，蜜三郎多次反对鹰四以及村民的记忆，虽然其作为叙述者具有天然取信于读者的优势，但我们可以于结尾处得知，真相只是埋藏在地下石室之中并未被任何人掌握。对于根所 S 二的回忆，蜜三郎与鹰四产生巨大的分歧，蜜三郎按照自己的回忆试图纠正鹰四对于 S 哥的崇拜，将其被打烂的尸体描述为“黑色扁平的袋子，露出红色物体”（大江健三郎，2021），对试图回忆的鹰四则剥夺了其对于过去汲取力量的权力，将其定义为只会听命、几乎无意识的孩童。其实对于鹰四的回忆目的，蜜三郎也有清楚地认识，他将之称其为“注入了一个热切的愿望”（大江健三郎，2021），并且因阿仁接受了朝鲜人黑市的大米就将对抗朝鲜人的 S 哥的行为视为“愚蠢而绝望的冒险”（大江健三郎，2021）。在此，蜜三郎成为为历史辩护的工具，充当了强权政治的奴役工具。失败者失去了发出声音的机会，历史主义试图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成为一句空谈，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提到的，“只有被救赎的人才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援引的过去”（本雅明，2014）。

相对于持有历史主义史观的蜜三郎，鹰四则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一方，借助对百年前祖先的“过去”的呼唤从而达到改造“现时”的目的。这种试图通过唤醒被压抑的历史记忆来激发革命性

能量的做法，恰恰呼应了从安政大狱到安保斗争中受压迫者的一贯抗争逻辑。被压迫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对象，它纠集潜藏在群众之下的革命要素，并将其作为行动的根源。历史唯物主义在统一的历史连续体中炸开一个豁口，将异质性的希望从中释放出来。本雅明（2014）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的重构其目的在于实现救赎，其对“弥赛亚”的引用使得救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约定被表达为当下对往事的承认与义务。鹰四就是在这种对于过去的认领下获得使命感与责任感，从而实施暴动洗刷自身由曾祖父所带来的耻辱。基于对进步主义与线性时间的批判，本雅明将过去与现在并置，历史的天使也不再望向未来，在《柏林童年》里本雅明（2016）就谈到：“我感到，那基座回廊里闪烁出辉煌业绩的英雄们，与被飓风抽打、被树桩碾得血肉淋漓、被大块冰山冻住而在忏悔的那帮人默默地一样声名狼藉”。所以在鹰四眼中，顺应时代存活的祖父如同失败的弟弟一样声名狼藉，甚至更甚，保留至今的象征着曾祖父背叛的仓房在现时与百年前曾祖父弟弟形成并置与对比。时间的三个维度在此刻完成了互动，受压迫的先辈的呼告超越时空传递给了当下的施救者，鹰四意识到了自己对于过去之人所背负的责任以及第二条论纲所说的“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本雅明，2014）。本雅明提出了跳跃的、流动的“意象”用于弥合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裂隙。小说中，充当“意象”职责的是将历史人物再现于世的念佛舞，不论是曾祖父还是S哥甚至最后自杀的鹰四都出现在念佛舞的队伍当中。在此，过去作为意象，完全达成了与现在合力作用的基础，并随时可以爆发出影响当下的巨大力量。然而，鹰四的局限性也体现了本雅明理论在现实政治中的困境——当历史唯物主义的救赎渴望脱离具体的阶级斗争纲领，便容易退化为对暴力本身的美学崇拜。同样，鹰四暴动的失败也源于此，本雅明所谓的“现时”任何人都可以乘虚而入，即便是负有乱伦惨剧的鹰四也充当起了“弥赛亚”的角色，缺乏更加明确的行动纲领，导致了暴动只是个人情绪的追思而非落实与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2015）所言，“以意识、意象、记忆和经验这些字眼描绘阶级斗争，而在其政治形式问题上却几乎完全不置一词”。这种个体救赎与集体解放之间的对比，反应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政治暴动的根本矛盾——从尊王攘夷到反安保，革命激情如何超越象征性反抗而转化为切实的社会变革，始终是未解的难题。

这一进程下交织着开国与锁国的撕裂、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井伊直弼遇刺象征武士阶层对专制统治的反抗，1960年桦美智子之死则标志战后民主意识觉醒；1860年万延元年“咸临丸”使团赴美与小说中鹰四百年后赴美的镜像对照，凸显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反复遭遇的身份焦虑。时间在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都完成了并置。从樱田门外之变到安保斗争，暴力既是旧秩序崩解的催化剂，也是新价值诞生的阵痛，两者共同构成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权力重构与集体记忆的深层隐喻，正如小说所揭示的——历史暴力的循环始终缠绕着个体与国家的命运抉择。

除却全国性的暴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同样深植于四国爱媛县内子町的地方暴动史，尤其是明治维新前后的“奥福暴动”（1866年）与“郡中暴动”（1871年）更是成为《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核心原型。大江自幼从祖母讲述的暴动叙事中汲取养分，这些故事以“奥福暴动”为主轴，将幕末动荡与个体命运交织成史诗图景。1866年7月，大濑村贫农福五郎因借粮遭拒，愤而联合神职人员立花丰丸发动暴动。立花撰写檄文，号召农民摧毁为富不仁者的商铺，不合作村庄则被焚毁，以示惩戒。暴动自大濑村酒铺打砸始席卷三十村、万人参与，共六十余间商铺遭劫。大洲藩急报幕府同时诱降首领，福五郎被劝服解散队伍后遭捕，与立花先后死于狱中。这场爆发于幕府崩解前夜的暴动，既折射农民对苛政的绝望，也暗含权力体系崩坏时底层力量的迸发。小说中鹰四所呼唤的祖先力量就来自这场暴动，其中细节处处吻合，但其失败的祖先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而成功的暴动则无人知晓，只存在于曾祖父记载的《大洼村农民骚动始末》的册子中。当地下石室重见

天日，曾祖父弟弟的第二次成功暴动才被知晓。在明治四年的暴动中，“血税”是同时被文本与现实关注的关键词。

征兵制与学制是明治政府最早颁布的法规，作为迈向现代的第一步，另一种制度其实均将改造落实在孩童或者说少年身上。在“血税一揆”中，既有庶民对征兵制与学制的无法理解，也有明治政府在对法语文件译介方面的疏忽，但根本来看仍旧是庶民甚至残存幕府势力对固有社会制度的留恋与依赖。对于“孩童”概念的现代式发明，“从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们的角度来说，孩子被学校夺走等于固有的生产方式遭到了破坏”（柄谷行人，2019）。血税一揆在各地爆发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即对明治政府征兵的反对。根据事后调查，起义暴动的起因似乎是源于庶民对天皇上谕的误读。在诏书中，“西人”“血税（血汗钱）”被理解成了经政府之手向西方人献上自己的鲜血。这个荒唐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国民对天皇政府的反抗。但不止于庶民的反抗，原萨摩藩主岛津久光就以血税暴动为由，连同太阳历的使用、武士散发、“脱刀”等问题质问明治政府（冯玮，2012）。彼时的岛津久光不仅保有留守政府的最高决策权，而且对原萨摩藩藩士西乡隆盛具有很大影响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国范围内的旧幕府势力。由此可知，明治维新后经济走上快车道的日本在政治领域并非铁板一块，血税暴动政府最后的妥协暴露了其左右摇摆、权衡利弊的暧昧处境：若不进行维新改革，则列强将入侵，导致国家的灭亡；若进行维新改革，则可能引发国民的痛苦，且国家未必能实现真正的强大。若对人民的痛苦不予缓解，则可能激起人民的起义，进而导致国家的灭亡；若采取缓解措施，则可能导致保守势力的复苏。

正如 1945 年的历史所揭示的，国家最终仍可能走向灭亡。这种看似无法避免的悖论，揭示了明治维新这一自上而下的改革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日本近代畸形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深刻矛盾与弊端。

三、山谷中的历史回响

大江在小说创作中，设置现实的印记无处不在，它不仅支撑着角色的内在逻辑，而且使其与历史产生呼应，形成现实与虚构交织的“暧昧”关系。

鹰四，作为积极参与安保运动的进步学生，其身份尤为突出。最为左翼进步学生的他选择与日本右翼议员同行，并与共同参与政治斗争的同窗组建了一个名为“背叛”的剧团，远赴美国上演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向美国民众表达了对妨碍美国总统访日行为的歉意。剧团参与学生运动确有其事，在 6 月 15 日包围国会抗议的人群中就有“新剧团”的身影，“紧接着，数十名暴力团分子冲入人群里，挥舞着钉有钉子的棍棒，造成了多人重伤……当中许多是平民百姓，或是‘新剧团’的成员”（施奈华，2023）。但是，作为左翼进步学生的鹰四与右翼的媾和动机并非完全出自角色自身，日本右翼与左翼在战后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互通与转化，子安宣邦（2019）以“东亚新体制”为例，指出 1940 年代日本帝国右翼所倡导的“东亚新体制”在附加了“包括对日本资本主义之根本改造的内涵”这一条件后可以成为 90 年日本左翼的口号，在于两者的世界史认识和在此基础上面向新世界秩序而做出有关亚洲的自我主张。其话语在构成上具有共通性。但鹰四并非真心“悔改”，在巡演期间他试图逃离剧团，但从发回日本的新闻报道来看，其并未成功。小说中，蜜三郎的疑问也代表了读者的困惑，“我试图分析弟弟为何一改初衷扮演起悔过自新的学生运动家角色，但这超越了我的想象力”（大江健三郎，2021）。

鹰四身上所表现出的“暧昧”困境并不是完全来自于大江的艺术塑造，身处 60 年代的日本大学生本身也面临着这一困境。作为战后日本第一批大学生，他们具有极强的精英意识，对于社会事务高度关心，但盟军带来的民主意识又使他们厌恶选拔性质的升学模式。对处于升学竞争洪流中的高

中生, 及根据成绩被分级的大学生而言, 将自己定位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正好符合自己的亲身感受。于此, 日本大学生体悟出“加害者=被害者”的认知范式, 该范式之后也被越平联领导人小田实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给日本人带来对战争的恐惧, 从而在经历战争的一代人心树起和平意识, 但未经历过战争的高中生并不拥有对于战争的记忆。于是, 小田实赋予为美国提供“越战特需”的日本社会“加害者”的身份, 以此在进步学生当中呼吁和平。从“受害者”的自我定位到“加害者”的道德设限, 体现了战后日本对于自身在东亚格局当中的左右支绌的“暧昧”困境, 也体现了学生这一群体困顿的精神世界。

除了进步学生身份, 鹰四对暴动祖先的向往也构成其性格的一部分。作为暴动的领导者, 鹰四的形象符合契合志士与博徒的形象。志士大多为下层武士, 活跃于 19 世纪 60 年代, 企图通过暴力推翻政权, 其目的中还是持有爱国的因素, 并为后世树立了暴力反抗的先例。而博徒则是“往往没有正式的户籍, 收入仰赖赌场, 所以依靠暴力维护地盘, 形成类似家族的拟亲关系”的群体, 他们是纯粹的暴力专家, 不同于志士消失于明治时期的政治环境,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日本的暴力组织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施奈华, 2023)。鹰四就是这样两个暴力身份的混合结果, 但二者却也充满冲突, “志士与博徒无不涉足政治。然而, 与志士不同的是, 博徒并非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关心, 或是对西方势力鲸吞蚕食的恐惧, 而是因为他们地方上以暴力闻名的人, 所以被卷入了政治当中”(施奈华, 2023), 一定程度上这就是鹰四矛盾的根源, 矛盾在于志士与博徒身份的不断转换与不确定。鹰四博徒的身份不仅出于其对暴力的使用, 与村民的领导关系也是其要素。博徒与山谷村民在德川时代初期并非敌对关系, 他们更可能被视为镇上的士兵或保护当地社町的町奴, 可以避免浪人侵扰村庄。博徒还会交好村中的弱势群体。例如“有一位名为势力富五郎的博徒老大就给村子里的穷人以赏钱而闻名, 也会给农民提供一些矛枪, 让他们保护自己。国定忠治尽职做好村里好几口井的清理工作, 村长就不仅允许他经营赌场, 还会在幕府官方派人来巡查时, 向他通风报信。用史学家安丸良夫的话来说, 博徒与村庄的这种关系, 使他们无登记或非法之徒的地位, 转化成某种地方上的‘有力者’”(施奈华, 2023)。在幕末时期, 他们甚至成为一些乡村起义事件的领导者, 就如同鹰四一般。直到现代, 经过整理和曲解的博徒的“劫富济贫”理念, 常被用以合理化那些并非真正侠义的暴力行为。时间来到 80 年代, 志士一词被壮士取代, “壮士”一词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指的是“那些参与政治的年轻人, 他们的使命是扩大人民的权力”(施奈华, 2023), 对于民权的诉求使“壮士”一词变得冠冕堂皇, 但本质上依靠的仍是暴力手段, 与志士的暗杀行为并无二致, 如 1885 年的大阪事件, 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扶植朝鲜亲日改革者金玉均的就是壮士这一群体。与志士相比, 除了依靠暴力手段直接干涉政治, 壮士还会通过集会或者服饰塑造个人的男子气质以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尽管大规模的集会被政府禁止, 但他们还是可以以举办运动会为借口聚集, 如同鹰四为山谷青年准备的足球训练, “这些运动会以其政治内涵与多样的形式不断考验着明治政府, 因为这些集会多元的本质是在试图规避 1880 年 4 月颁布的《集会条例》。该条例为了控制自由民权运动, 禁止了学生的室外政治集会和政治活动。运动会也反映出体能是壮士重视并培养的能力, 运动本身、身体活动与训练程度, 都是这些运动会的一部分”(施奈华, 2023)。壮士群体中年轻学生占据很大的成分, 这也使其与鹰四现代的进步学生身份交融, 实现百年前后暴力政治活动家的身份重叠, 施奈华(2023)就指出“当时有些学生把自己装扮成志士, 在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中可见此类学生。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 东京的学生暴力不但公开且常见”。

除了暴力的困境, 鹰四也陷入性的“倒错”当中, 不断监视自身的“内面”无法自拔, 柄谷行人(2019)指出《马太福音》里“有一种令人恐怖的颠倒。不可奸淫不仅是犹太教的戒律, 也是其他宗教的戒律, 但是在视奸淫之‘心’而非其‘事’为问题这一点上, 基督教有着无以类比的倒错

性。如果人们有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在不断地窥视色情。他们必须时时刻刻注视着‘内面’，时时监视从‘内面’的什么地方涌现出来的色情。实际上，这个‘内面’正是在这种监视下产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此，‘肉体’或者‘性’被发掘出来了”，正因为鹰四对于性的“倒错”认知，导致其无法摆脱自童年起对于白痴妹妹性冲动的困扰，一直延续到黑人妓女以及山谷姑娘，这种异常在日本文学史可追溯至田山花袋的《蒲团》处。

蜜三郎作为鹰四的兄长，与其保持着一体双生的关系。大江健三郎（2019）曾经谈到“细想起来，这两者都是没有年龄差距的年轻人，可一个家伙在行动，另一个家伙只是在注视着这一切（不久后也开始以该事件为主题而写作小说），就这样，我把自己一分为二，亦即实际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并因此而受伤的人物，以及另外一人、只是一味进行思考却并不行动的人物。这个人物郁闷地待在家里读书，可最终还是受了伤。考虑到这样一个分身，便虚构出了二人组合——根所蜜三郎与鹰四这对兄弟”。因此，小说最后蜜三郎接受去往非洲的工作、采集如鹰四所说“在巨大的灰色肚皮上写有‘期待’字样的大象”（大江健三郎，2021）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大象”的选择并非随意为之，蜜三郎这一背负杀婴罪行的角色最终将命运交付给大象——这一在日本具有浓厚历史色彩的动物，是具有历史依据的。

通过桃子之口，我们得知鹰四认为的人类的善良就是“人类还千里迢迢去非洲草原捕大象，再越过大海把大象运回来养在动物园里”“如果将来成为有钱人，他也要自己养一头大象。他好像想在仓房建一个象栏养，还想把石围墙下的大树全都砍了，好让孩子们无论在山谷的什么地方玩耍，只要仰起脸就能看见大象”（大江健三郎，2021）。但蜜三郎却不认同，他思考的是面临核弹的轰炸无处可逃的大象的处境，这在日本历史上确实发生过。饲养于上野动物园的三头日本国民级别的明星大象——Tonky、Wanri 和 John，就曾身处美国的轰炸危机之下，从而被日本军方无情的杀害。动物园在战时日本已经脱离了为青少年科普知识的作用，古贺及其战时接班人福田三郎，自 1941 年 8 月起负责上野动物园的管理，与日本军方及农商务省官员携手合作，致力于将动物园转变为军事化的训练场。动物园的动物们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将人们的关注点从战争的残酷现实中转移，聚焦于展现士兵的“骑士精神”和动物伙伴们的忠诚故事，动物园在这里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阵线。动物园作为日本通向外部世界的探望镜，其作用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望尘莫及的。动物展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融入都市生活的一种方式，其推动作用始终存在。这些努力不仅加速了战争危机的降临，而且与危机的发展同步进退。米勒（Ian J. Miller，2023）在其著作中指出“上野动物园成为游乐屋里的哈哈镜，映照出日本在战争期间的乌托邦梦想。管理者们寻求将动物园的活动，与帝国战时疯狂的海外扩张和国内经济收缩协同起来，由此发起了一个双向运动。首先，动物园内部的再现世界开始掉头向内，试图为后方民众重新构建生命的意义。管理者鼓动游客从动物园的动物居民身上看到某种和自身相关联的东西，将这些圈养的动物视作自家的亲戚朋友而非帝国种族主义意义上的他者……特别是那些和军事行动相关度更高的动物。动物园三头广受欢迎的体型庞大的亚洲象——Tonky、Wanri 和 John——被标榜为天然典范。它们在大象秀活动期间会挥舞太阳旗，也会一本正经地跪倒在动物慰灵碑前面”。尽管日本军部方面宣称处死大象是为了防止其出逃从而伤害民众，但其一系列献祭的做法明显无法对应其说辞，他们“更在意的并非杀戮本身，而是杀戮的公开纪念仪式”（米勒，202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象在日本军部眼中被视为献祭品与军事物资，但在动物园管理者眼中却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福田三郎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就将上野动物园大屠杀比作一场杀婴行为，米勒（2023）指出“在福田园长的话语中，从人类孩童向无辜的动物受害者的游移相当引人注目。它阐明了这次大屠杀事件各方面细节中流露出的强烈的模棱两可性质。人们很难去想象比杀掉自己的孩子更为恐怖的隐喻，它也表明了动物园工作人员身处的可怕的两难窘境，一边是职

业角色的需要，另一边是朝夕相伴的动物，从而视这些被照顾的活物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情感事实”。因此，可以推断，蜜三郎最终对大象的选择并非完全认同鹰四关于封闭动物园的构想，而是体现了对自身曾经遗弃的畸形儿进行救赎的意愿。

作为外族形象代表的超市天皇也富有历史色彩，其集合了美国占领军、日本天皇与朝鲜劳工的三重形象，是日本民众战后“暧昧”态度的集合体与投射对应物。如同天皇一般，超市天皇具有令村民臣服的慈爱，天皇“在直接听取当地官员介绍的过程中，天皇会表现出眨眼侧耳、应许点头等动作。介绍完毕后，他往往会留下‘继续努力’等鼓励话语。当地的民众发言常见的表达则都是‘陛下亲莅至此，我等已然忘记过去遭受的苦劳。另外，逝去的人们也会安心满足’之类千篇一律的套话”（吉见俊哉，2024）。甚至在战后，日本还曾经出现过多位“伪天皇”，来自名古屋的杂货商熊泽宽道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全国上下多达 30 人自称具有正统皇位继承权”（吉见俊哉，2024）。尽管“伪天皇”频繁出现，我们却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对于天皇的反叛与质疑，其中更为深层的是对于天皇以肉身作为权力中枢的国家体系的强烈热情，将自身与其同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天皇制的共情。所以，山谷村民给超市天皇冠以如此的名字就可以看作对于天皇形象的一种投射。而连同超市天皇来到山谷的电视也在日本现代具有重要意义，多数日本人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来“拥抱”作为家庭生活样板的“美国”，而电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家具。因此，电视在山谷中成为由一位朝鲜劳工带来的象征美国的等同于天皇馈赠的“神物”的存在，吉见俊哉（2024）指出“对于多数日本人而言，电视机不是‘买来’的，而是‘到来’的。……在这些家庭中，电视机被拟人化，与其说是购买来的商品，倒不如说是‘天赐良物，来到家中’。这种拟人化的修辞在战后日本人的日常意识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虽然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却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神性’的存在，当天皇到全国各地视察时，民众心里面也不免有‘到来’或者‘莅临’的感觉”。随着电视兴起的摔跤运动也为日本培养出一位出身朝鲜的民族英雄，猪瀬直树曾总结道：“与其说电视因摔跤而普及，不如说摔跤因电视而兴起，力道山正是借助于电视而成为英雄，电视则因为产生的英雄而吸引观众的关注”（吉见俊哉，2024）。力道山，这位自朝鲜半岛穿越玄界滩抵达日本的摔跤运动员，其摔跤技艺深刻映射了战后日本对美国这一曾经敌对、占领并最终成为保护国的国家所持有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通过电视媒介得以具象化展现。以大阪和九州为活动基地的职业摔跤选手们对摔跤的理解多局限于格斗竞技的范畴，而力道山则能预见电视机前数百万观众的狂热反应，进而将摔跤提升至民族象征的高度。他精准地将当时民众对美国的复杂情感融入其表演之中，从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结语

《万延元年的 Football》通过家族叙事和时空镜像，展现了日本近代化中“暧昧”与“暴力”的交织。小说揭示了日本知识分子在历史暴力中的困境，以及战后日本拥抱美国策略背后的帝国幽灵。大江的文学实践，最终指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可能。当万延元年的暴动记忆通过祖母的口述重获血肉，当战象的亡灵在核时代的阴影下复活，小说撕开了官方史观对民间记忆的遮蔽，暴露出历史暴力的创伤本质。这种以文学重构历史的努力，不仅是对施奈华所言“近代国家诞生于暴力”的深刻印证，更是对吉见俊哉笔下“亲美与反美”困境的终极诘问——在“暧昧”成为民族宿命的时刻，唯有直面暴力的遗产，方能在现代性的废墟上重建真正的人性联结。而《万延元年的 Football》留给当代的启示正在于此：历史从未终结，它始终在暴动的余烬与暧昧的迷雾中，等待着被重新讲述。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Yifan ^{ID} <http://orcid.org/0009-0007-7231-2387>

References

- 大江健三郎 (2006):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邱雅芬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 [Ôe, K. (2006). *The Silent Cry*, translated by Y. Qiu.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 大江健三郎 (2021):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邱雅芬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Ôe, K. (2021). *The Silent Cry*, translated by Y. Qi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大江健三郎、尾崎真理子 (2019): 《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 许金龙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Ôe, K., & Ozaki, M. (2019). *Kenzaburô Ôe Oral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J. Xu.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冯玮 (2012): 《日本通史》.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Feng, W. (2012). *General History of Japan*.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吉见俊哉 (2024): 《亲美与反美》, 王广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Yoshimi, S. (2024). *Pro-American and Anti-American*, translated by G. W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柄谷行人 (2019):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赵京华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Karatani, K. (2019).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J. Z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鲁思·本尼迪克特 (2013): 《菊与刀》,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Benedict, R. (2013).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translated by D. H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瓦尔特·本雅明 (2014): 《启迪: 本雅明文选》, 汉娜·阿伦特 编, 张旭东、王斑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Benjamin, W. (2014).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H. Arendt, translated by X. Zhang & B. W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瓦尔特·本雅明 (2016): 《柏林童年》, 王涌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Benjamin, W. (2016).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 translated by Y. Wa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特里·伊格尔顿 (2015): 《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郭国良、陆汉臻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Eagleton, T. (2015).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G. Guo & H. L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英子·丸子·施奈华 (2023): 《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 游淑峰、余静颖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Schneider, I. M. (2023). *Ruffians, Yakuza, Nationalist*, translated by S. You & J. Yu.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 伊恩·J. 米勒 (2023): 《樱与兽: 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张涛 译. 上海: 光启书局。
- [Miller, I. J. (2023).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translated by T. Zhang. Shanghai: Guangqi Books.]
- 子安宣邦 (2019): 《近代日本的亚洲观》, 赵京华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Koyasu, S. (2019). *Modern Japan's View of Asia*, translated by J. Zh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王升远 (2025): 政治诡辩、精神隐曲与不彻底的罪责反思——“开除公职”风潮前后的火野苇平, 《中国比较文学》(03): 230-246。
- [Wang, S. Y. (2025). *Political Sophistry, Spiritual Subtlety and Incomplete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 Fire Field Weihei Before and After the "Dismissal from Public Office" Upsurg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03), 230-246.]
- 王升远、陆相凝 (2025): 在人性之爱与战争责任之间——吉田满“大和战舰”叙事在战后初期的历史际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5): 63-74。
- [Wang, S. Y., & Lu, X. N. (2025). *Between Human Love and War Responsibilit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Yoshida Mitsuru's "Yamato Battleship" Narrativ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5), 63-74.]